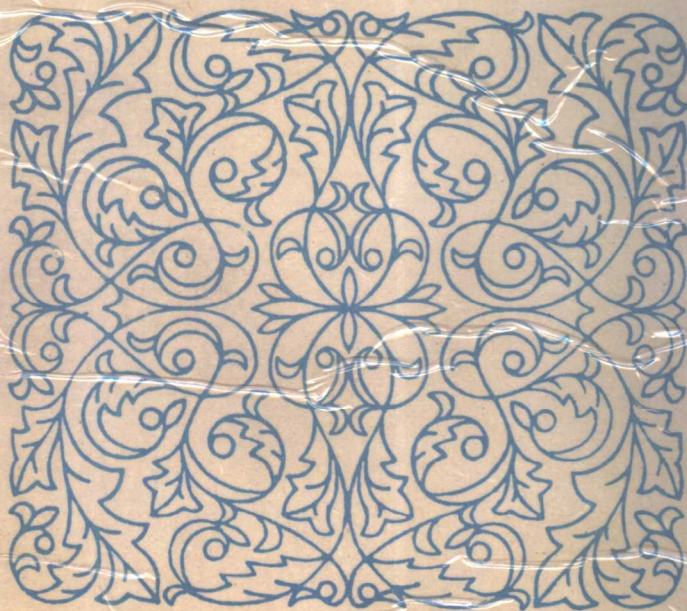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 64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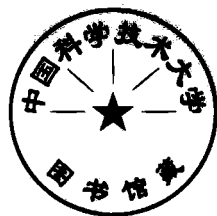
民國叢書

第四編

64

天學史·地理類

歷史哲學教程
歷史哲學
歷史哲學概論
歷史哲學論叢



翦伯贊著
朱謙之著
胡秋原著
常乃惠著

上海書店

翦伯贊著

歷史哲學教程

程教學哲史歷

• 元 價實冊每 •

贊 伯 翦 者 著

贊 伯 翦 者 行 發

店書知新 售經總

海上·慶重

• 印翻准不 • 有所權版 •

版初月八年七十二國民

版再月三年八十二國民

版滬月二年五十三國民

序

我原來是計劃寫一本關於中國社會史方面範圍較大的著作，我想在消遣方面，對於從來各家的中國史意見，作一較詳盡的清算；在積極方面，較系統地提出我自己的意見。但當我這一工作計劃正在進行的當中，由於神聖的民族抗戰的展開，便不能不略加改變。原來所搜集的一些材料，亦隨同京滬淪陷而失散，這在我個人，是一件值得痛惜的事情。

現在，我們的民族抗戰，已經把中國歷史推到嶄新的時代，中華民族已經站在世界史的前鋒，充任了世界史轉化的動力。爲了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勝利，我們認爲決不應使理論的發展，落在實踐的後面；反之，我們認爲，必須要以正確的活的歷史原理，作爲這一偉大門爭的指導，使主觀的努力與客觀情勢的發展，相互適應。因此，我在今年二月，便開始改寫這本歷史哲學教程。

在這樣一個偉大的歷史變革時代，我們決沒有閒情逸致埋頭於經院式的歷史理論之玩弄；恰恰相反，在我的主觀上，這本書，正是爲了配合這一偉大門爭的現實行動而寫的。在目前，隱藏在民族統一陣線理論與行動陣營中的「悲觀主義」「失敗主義」等等有害的傾向，雖都有其社會的歷史的根源；因而從歷史哲學上去批判過去及現在許多歷史理論家對中國歷史之一貫的錯誤見解，及其「魔術式」的結論，是我們一個不可逃避的任務。

近十餘年來，出現在中國歷史科學戰線上的實驗主義，他們在史料的考證上，確實有着相當的貢獻；但在其

12844

對具體歷史的研究上，却反而把中國史學化，在某些意義上，甚至給了許多相反的影響。歷史的形式主義者，隱藏在史的唯物論的外衣裏面，傳播「半波格達諾夫主義」「半實驗主義」的毒素，迷惑於歷史的零碎現象，拒絕對歷史之本質的說明。經濟唯物論，即機械論者，也同樣隱藏在史的唯物論的術語之下，無恥地從事於對史的唯物論之修正、割裂、歪曲，企圖假借科學社會主義，發掘其政治上之反動的陰謀，在理論上，使歷史復歸於進化論。另一方面，在某些史的唯物論的歷史家的名著中，他們雖然盡過了主觀上的努力，但對於歷史理論之本質的理解，也依舊不免犯了或多或少的錯誤。

正在過渡時期的中國社會情勢下，歪曲與錯誤的理論，反能獲得其流行的可能。在大學的講座上，在各種流行的刊物上，到處散布其欺騙青年的毒素。他們任意歪曲、蒙蔽或塗改具體的歷史事實，以求適合於其階級的要求與幻想。像這樣各種各樣的歷史理論，不僅對於歷史科學的本身，是一個污蔑，那對於一般青年對中國歷史之正確的認識，尤其對於中國目前正在進行之民族解放鬥爭的前途的認識，更是一個毒害。因此，對於這些錯誤的歷史理論之澈底地澄清，不僅是歷史科學的研究任務，而且是目前中國民族解放鬥爭中一個緊要的政治任務。但是假如把那各種各樣的歷史理論，一一加以批判，那會把我引導到極其廣泛的領域中去，而況事實上，大半又是反復陳說，千篇一律，沒有一批批判的必要。因此，我在本書中，僅就在中國歷史研究領域中曾經或一直到現在還可以多少發生一些支配作用的幾種理論體系，作為批判的對象。

我所以特別提出歷史哲學的問題，因為無論何種研究，除去必須從實踐的基礎上，還必須要依從了正確的方法論，然後才能開始把握和理解其正確性。歷史哲學的任務，便是在從一切錯綜複雜的歷史事變中去認識人類社會之各個歷史階段的發生發展與轉化的規律性，沒有正確的哲學做研究的工具，便無從下手。然而在中國

歷史哲學，雖然在近年來所展開的社會史論戰中附帶地提到，但不幸大多只注意到文句的抄襲，而忽視那具體的歷史事實，因而便不免是引經據典，以抽象的定義去歪曲真正的具體歷史，反而把史學玄學化。結果，歷史哲學在中國，或者沉溺於刻版的公式主義，或者使理論脫離實踐，陷於純經院式的無病呻吟了。所以一直到現在，關於歷史哲學之系統的著作，在中國我們還沒有看見。因而我想到李達的社會學大綱，雖然不是一部歷史哲學的著作，然而却是值得歷史研究者一讀的。此外盛岳譯的史學新動向尤其是值得特別介紹的。由於歷史哲學在中國歷史科學的領域上，沒有展開其更高的發展，所以中國的歷史家，至今還不會寫出一部正確的中國通史，即分期史，也還相當的貧乏，至於世界史，更沒有提到研究的課程上。

關於中國通史，除日本歷史家森谷克己的中國社會經濟史，佐野袈裟美的中國歷史讀本，蘇聯歷史家沙發諾夫的中國社會形勢發展史，拉狄克的中國革命史，馬札亞爾的中國農村經濟等似是而非的著作外，我們還沒有看見一部相對正確的中國通史。

在原始社會史方面，在中國史學界，較有系統的著作，除呂振羽的史前期中國社會研究，以及專門從事史料考證與原始社會史料有關的，如顧頡剛的古史辨，郭沫若的關於金石甲骨文字的著作，以及李濟著作等人關於安陽等地的發掘報告書等等外，就只有一些零碎的論文。而這一原始時代的歷史，對於說明後來一切繼起時代的歷史之重要，又是無疑的。

關於中國奴隸社會史以至初期封建社會史，除了郭沫若的中國古代社會研究，呂振羽的殷周時代中國社會，柯金的中國古代社會外，雖還有幾部堆砌式的著作，但都是沒有其自己的系統。

關於中國封建社會全史，除出一些史論的著作外，在中國只有胡適的中國哲學史大綱第一冊，馮友蘭的中

國哲學史、陶希聖的中國政治思想史、一二三四冊、呂振羽的中國政治思想史、楊東蓀的中國學術思想史講話以及譚不模的宋元明學術思想史綱、清代學術思想史綱中，關於這一階段的歷史之部門的即政治形態或意識形態的敘述。對於中國歷史這一長時間的演變之全面的敘述的著作，也還沒有出現。然而這一封建社會的歷史，在中國歷史發展中，又有其極重要的地位。

關於中國近百年殖民地化這一過程的歷史，除去施存統的中國近代經濟史、李鼎聲的中國近代史以至作為部門之研究的何幹之的近代中國啓蒙運動史外，也沒有有系統的著作。然而這一時代的歷史，對於目前中國的民族解放鬥爭，尤有其直接的影響與作用。

此外，關於國內各民族，如回紇、西藏、蒙古、女真、苗族、苗族、苗族……等的社會史，以及與中國歷史有關的各民族，如琉球、朝鮮、安南、印度，以及南洋各地、中亞細亞各民族的歷史，尤其是日本史，更是無人着手研究。自然，爲了史料的缺乏，歷史家也不能憑空杜撰，同時，對於各民族民俗學的研究，也不是風雨飄搖中的我國歷史家所能如願進行的。但在事實上，不研究這些民族的歷史，與中國歷史之相互影響的作用，要想寫成一部正確的中國通史，又是不可可能的。

一直到現在，在中國歷史科學研究的領域內，還存在着許多荒原區域，需要繼起的歷史家，從事於歷史科學之拓荒運動。因此，我深切地希望我們新興的歷史家，大家用集體的力量，承繼着我們先驅者努力的成果，依據正確的方法論，依據中國歷史資料的總和，來完成中國史的建設，並從而以正確的歷史原理，來指導這一偉大的民族解放的歷史鬥爭，爭取這一偉大的歷史鬥爭的勝利。

在我寫這本書的時候，主觀上，已經盡可能地去求其正確，至於客觀上，本書的正確性，能達到如何程度，還只有等待着大家的批判和指教。

著者

一九三八年五月三〇日於長沙

羣衆領袖與歷史 再版代序

一

本書在一年內再版，對於我倒是一件出乎意料之外的事。

在再版時，本書除了在文句方面略有修改；在理論方面，我對於一年前的見解，還沒有覺得有修改的必要。并且本書是帶着論戰的性質，在我批判的對方沒有改變之前，我當然不應作任何改變。

我在這裏唯一想補充的一點，便是「羣衆及其領導者在歷史中的作用。」關於這一點，我在本書第三編論「客觀條件與主觀創造之辯證的統一」一節中，已經說到，不過，爲了澈底地說明這一問題，我以爲還有補充的必要。

現在，我們在唯物史觀的歷史家的著述中看不見一個「歷史人物」的名字，就正像我們在舊的歷史著述中看不見「社會經濟形態」的發展痕跡一樣。忽略歷史客觀發展的規律，是史的觀念論者的一貫作風；忽略歷史主觀創造的作用，也不是辯證唯物論者的歷史理論。辯證唯物論者，他與觀念論者及機械論者不同之處，就在於他不僅同時注意歷史之主觀創造作用與其客觀發展的規律，並且尤其注意他們在歷史運動中之辯證的統一。現在，在世界各地，在亞細亞，歐羅巴，阿非利加，到處都展開了戰爭與革命。殖民地奴隸與無產階級的鮮血，刷紅了資本主義的世界。在中國與西班牙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大旗下，幾百萬人的英勇犧牲，幾千萬人的戰鬪動

員，幾萬萬人的走向反法西斯侵略戰爭的戰慄。這種壯烈而偉大的歷史行動，標示了人類歷史走向新階段的象徵。這一方面，固然是世界史自身發展的規律，已經達到了一個突變的時代；然而同時，也說明了羣衆在歷史創造中的作用之偉大，說明作爲羣衆領導者的個人在歷史創造中的重要。

一直到今天，中國還有不少的人忽視羣衆在革命戰爭中的偉大作用，還有人阻礙着羣衆運動在民族解放戰爭中之發展，這證明了理論上的錯誤，必然要發展爲實踐的行動。爲了這種原因，我以爲在這裏特別的補充這一點，不是沒有意義的。

二

科學社會主義的創始者認爲舊的唯物論的理論最主要的缺點之一，就是沒有把握羣衆行動的規律及其對歷史的創造作用。史的唯物論者他不懂承認羣衆對歷史的創造作用，並且從其生活諸條件上研究領導羣衆行動的規律。

馬克思恩格斯在其早期的著作之一中，曾經這樣說過：「歷史的行動愈徹底，則推動這一歷史行動的羣衆的力量愈廣泛。」在這裏，馬恩所謂徹底的歷史行動，當然是指的歷史上的革命行動。因而在這句話中就包含着一個反面的意義，即任何帶有反動性的歷史行動，是不能得到羣衆的擁護的。

只有當着基督教的運動，還是反奴隸制革命運動的時候，他才能在古代世界喚起一個具有廣大信徒的宗教運動。只有當着法國的資產階級還是一個革命階級的時候，他才能喚起一個以農民爲主力軍的法國大革命。只有當着美國爲了爭取民主主義前途的時候，他才能在新大陸喚起一個光榮的獨立戰爭。

在中國歷史上也是一樣，只有在反奴隸制的號召下，才能使周武王喚起一個「億萬人一心」的朝政之戰，只有在反秦代地主階級專政的號召下，才能使廣大的農民在陳涉吳廣的領導之下，揭竿而起。只有在反大地主的剝削的號召之下，趙匡胤的陳橋起義，才能獲得小土地所有者及廣大農民的響應而達到宋代政權的建立。只有在種族革命的號召之下，朱元璋才能喚起全國人民的興起，驅逐韃靼人出中國，洪秀全楊秀清才能喚起一個幾乎推翻滿清政權的轟轟烈烈的「太平天國」革命運動。只有在反帝的號召之下，才能在中國北部喚起一個「義和團」的運動。只有在更進步的三民主義的號召之下，才能使孫中山先生所領導的「辛亥革命」在全國各階級各種族的人民的熱烈擁護之下推翻滿清政權，建立中華民國。只有在反帝反封建的號召之下，才能喚起一九二五——二七年的中國大革命，剷除北洋的封建軍閥，建立中國國民黨在中國的政權。

這些歷史上的事實，充分地說明了馬恩理論的正確。這種理論的正確性，在近代史上，許多新的歷史事實中，獲得了更充分的證明。

在近代史上，第一個最徹底的歷史行動是蘇聯社會主義的偉大的「十月革命」。他從其社會經濟最深的根基上，廢除了剝削階級與人剝削人的制度，建立了沒有歷史先例的無產階級的政權，創造了嶄新的社會主義社會，像這樣的歷史行動的徹底性，是一切過去人類史上所不曾有過的。因而也就沒有一個過去的歷史行動，能够像蘇聯「十月革命」一樣，廣泛而深刻地喚起了一萬萬五千萬人狂熱的鬪爭，喚起了全世界無產階級偉大的同情。

其次，便是在中國目前正在進行的偉大的民族抗戰，這一個歷史行動的徹底性，不僅在中國歷史上是空前的，就在世界史上，也是一個沒有先例的民族解放戰爭。就因為這一歷史行動的空前徹底性，所以他喚起了地球

上四分之一的人類，直接參加到這個戰爭，喚起了全世界和平的人類——尤其是國際無產階級與殖民地奴隸——的偉大的聲援與爲着這一鬪爭的勝利而吶喊。這一個偉大而澈底的歷史行動，他在中國引起了一個天翻地覆的變動，在民族革命的狂風暴雨中，多封建餘孽及機會主義者都被駭倒而轉化爲漢奸，大部分的中產階級都因爲失掉一切而疾速地轉化爲無產階級，廣大無比的勞動者和農民大衆都被迫而離開職業，離開土地轉化爲堅強無敵的抗日游擊軍，鐵道公路被破壞了，河道交通被阻隔了，海口被封鎖了，大部分的城市變成焦土，無數的農村變成沙漠，一切的文化遺存與文化機關，都變成灰燼了。在空前的民族大遷徙中一切作爲封建傳統聯系的，如家長制的主從關係，宗法社會的家族關係，都被切斷了被掃除了。在廣泛而持久的革命戰爭中一切作爲半殖民地屬性的，如帝國主義在中國的商品流通網，勢力分配圈，都被打破了，毀滅了。總之，這一個戰爭，他澈底地改變着中國社會經濟的原來的物質基礎，階級關係乃至建築於其上的政治文化與意識形態。

就由於這樣一個空前的澈底的大變革，在國際方面，造成了資本主義世界之更加狹隘，喚起帝國主義各國家間的相互矛盾之更加尖銳，喚起了國際勞動階級與殖民地奴隸之反法西斯侵略的高潮，創造了世界史突變的前提條件。在國內，喚起了民族資本向西南與西北之大量的移注，喚起了小機器工業與農村手工業在內地之蓬勃的興起，喚起了西南西北經濟建設與文化教育之普遍的發展，喚起了內地城市一般的繁榮，喚起了流動人口與荒廢土地之有利的結合。在這樣新的社會經濟基礎上，又喚起了中國政治民主化的開始，喚起了中國文化思想上之戰鬪的與革命的高潮。總之，這一澈底的歷史行動，他毀滅了中國舊有的一切，同時也創造了新中國的一切前提條件。

蘇聯的偉大的「十月革命」與中國的偉大的「民族解放戰爭」，他們之所以同爲最澈底的歷史行動，就

因爲他們同是執行人類解放——階級解放與民族解放——的歷史任務，所以也才能同樣地獲得廣大羣衆——整個階級或整個民族——的熱情的參加與擁護。蘇聯的歷史，已經證實了只有最被壓迫的階級，才能澈底地執行階級鬭爭的歷史任務；中國的歷史，又在證實着只有最被壓迫的民族，才能澈底地執行民族鬭爭的任務。同時，世界史的原理，又將證實着只有被壓迫的階級與被壓迫的民族在反法西斯侵略的鬭爭上，統一起來，才能完成整個人類解放的歷史任務。

這樣看來，只有澈底的歷史行動，才能喚起羣衆的力量，只有羣衆的力量與興起，才能執行任何一個歷史的行動；反之，沒有羣衆的力量，任何歷史的行動，也是不能實現的。因此，羣衆的力量與行動，是一切過去以及未來的歷史行動決定的力量。

三

從相反的方面看來，也是一樣。在歷史上，任何一種反動的行動，首先在其行動的本質上，必然是反羣衆利益的。因而他必然與羣衆對立。但歷史上存在的許許多多的反動，爲甚麼又有羣衆參加而使其得以實現呢？關於這一點，恩格斯在其描寫德國農民戰爭時，他引證了許多歷史事實，說明了在整個中世紀的歐羅巴所進行的反動歷史事件，都是隱蔽在宗教的外衣之下執行的。他指出了十六世紀的德國的貴族與城市中等級級爲了反對壓迫他們的封建諸侯，怎樣地發動了一連串的戰爭，怎樣地把每一次這樣的戰爭，都很巧妙地隱蔽在宗教的旗幟之下，怎樣地以宗教的迷信喚起當時德國農民大眾的同情，又怎樣地在每一次戰爭進行到一定階段時與其敵人妥協轉而出賣其同盟者——德國的農民大眾。

像這樣的歷史，不僅表現在十六世紀的德國，表現在中世紀的歐羅巴，同樣也表現在世界其他的地方，尤其在中國。在歷史之封建社會這一階段，任何國家的農民，總是經常被地主階級利用為爭奪政權的工具，他們一次次被利用，同時也一次次被出賣。在中國兩千多年的封建社會歷史發展中，不知經過了多少地主階級彼此間爭奪政權的戰爭，無數王朝的更替，事實上也就是剝削集團的換班。所謂「一朝天子一朝臣」，就是甲剝削集團讓位於乙剝削集團。然而每一個新的王朝的創立，都是農民大眾的力量，農民大眾為甚麼把一個戴着皇冠的地主拖下王座，而另外把一個草野的地主送上王座呢？把一個舊的剝削者換一個新的吸血鬼呢？這就是因為封建的意識限制了農民不能認識這些「英雄們」的本質，即他們同是地主階級，同是以剝削農民為生的強盜，而以為他們是一個不剝削農民的「真命天子」。因此，即使他們被出賣了一千次，他們還是希望在一千零一次不被出賣。同時，在另一方面，每當封建地主要利用農民大眾的力量，來建立其統治并剝削農民的政權時，他首先就把他自己變成一個「神話中的人物」，變成一個「人間的神」，用宗教的外衣，隱藏他自己，并以此蒙蔽農民的眼睛，用神祕的號召，喚起農民的盲動，他就把這種盲動的力量，引導到他自己目的上。這就是為甚麼中國歷史上每一個創業的帝王，不是「赤帝之子」，便是「白帝之子」，不是「以金德王」，便是「以木德王」。這就是為甚麼反動的歷史行動，也一樣能獲得群眾的參加而得以實現出來的緣故。總而言之，欺騙、麻醉與利用羣衆的愚昧無知，是過去一切反動歷史行動之可能實現出來的基礎方法。

其次，每一個歷史上的反動行動，單獨地或孤立地看來，是反動的；但若把他統一到整個歷史發展的行程上去看，他或多或少總是具有一些進步性的。因為由於這個反動，他本身就是歷史之辯證法的發展。譬如德國的農民戰爭，在其每一次出賣農民大眾的方面看來，是反動的；但在其反封建諸侯的方面看來，又是進步的。同樣在中

國，每一次王朝更替的戰爭，在其同樣都是爭取剝削農民的政權看來，是反動的；但在其每一次都是封建經濟發展之必然的結果上看來，則又是進步的。又比如法西斯侵略主義，在其屠殺無產階級及殖民地奴隸上看來，他是達到人類歷史最反動的頂點；但在整個資本主義經濟發展的歷史行程上看來，他又把這個制度，推到他的歷史終結點的一個必然的結果。就因為歷史的發展是矛盾的，發展，就因為每一反動，都是促進正動的一個積桿，就因為他在整個歷史發展行程上，都或多或少具有一些進步的意義，所以他才能產生出來。

其次，任何一個歷史上的反動，不是一開始就表現其反動性的，反之，他常常隱藏在一種革命的姿態上；只有當着他接近於成功或完全成功的時候，才會暴露其反動性。例如在中國史上，當着周武王發師伐紂的時候，他還隱藏在「吊民伐罪」的口號之下，只有當他毀滅了殷代的奴隸主的政權，把殷民整族整族地當作國土附庸，而分賜他的臣屬建立周代的封建政權以後，他才暴露他的反動性。只有當着秦始皇併吞六國，形成地主階級的統一政權以後，他才執行「焚書坑儒」的反動的政策。只有在漢高祖入關以後，他才發表與地主階級妥協的「約法三章」。只有當李世民奠定了唐代政權以後，他才開始以租庸調全部的負擔，加在他的同盟者——小土地所有者與農民——的身上。在西方的歷史上也是一樣，當莫索里尼還是意大利社會主義新聞（Avanti）的主筆的時候，他還是偽裝為一個最熱心的工團主義者和勞動運動的指導者的姿態，去建立其在羣衆中的信仰，只有在他以有名的「羅馬進軍」被羣衆把他擁上意大利的首相地位以後，他才公開地用黑衫黨員來屠殺羣衆。當希特勒在德國的法西斯政權還沒有建立起來的時候，他還是在其「四年計劃」中裝出對德國的小資產階級及勞動人民關心的態度，只有當他的鋼鐵隊組成以後，他才公開地把勞動階級當作他的「敵人」。像這些事實，在東方與在西方的歷史上，都如出一轍。這些歷史事實，就充分地說明了一種反動的歷史運動之發展的形

式，不管他到後來發展到如何程度，在其開始時，還是裝出革命的姿態使人看不出他是一個反動。假如汪精衛在喊着「革命者向左轉」的口號的時代而死了，誰能知道他懷藏着漢奸的陰謀。假如沒有第一次帝國主義的戰爭，誰能知道第二國際的英雄們是擁護屠殺無產階級的幫兇。因此，我們如果要暴露一種反動運動，或一種反動運動之被暴露，不是一開始就可能的，只有當着這種運動，在其進行中，不依照反動者的目的進行而走向真正澈底革命的時候，而且這種澈底的程度，達到那些反動者不能再容忍下去而又無力倒轉其方向的時候，他的反動性才能暴露出來。這就是爲甚麼托洛茨基派在蘇聯被暴露出來，爲甚麼中國有些漢奸，一定要在持久抗戰十八個月後，才能暴露出來的原因。

四

我們已經說過，在過去，羣衆被出賣一千次，還可以被出賣一千零一次；然而這樣的時代，現在已經過去了。由於科學的進步，宗教的觀念，逐漸在人類頭腦中被掃除，因而使得一切反動者失去一個最大的欺騙工具，并且也失掉了一個最終的隱蔽所。其次由於階級意識與民族意識的覺醒，并且形成了這樣的意識形態，他們認識了他們的階級敵人與民族敵人，因而使一切反動者無法隱蔽其反階級性與反民族的陰謀。此外，現在的羣衆，由於幾千年來的歷史教訓，由於其在現實鬥爭中所親身嘗試的痛苦，壓迫，與被欺騙，被出賣，被屠殺的血的教訓，使他們能够以他們自己的經驗，正確地認識一個歷史行動一個領導者的性質與傾向，并且由於不斷的失敗與不斷的鬥爭中，提高其自己對於政治的認識與警覺性，對於其敵人的戒備性，對於一個歷史行動之嚴厲的監視性。他們不但能够隨時發現這種歷史行動中的反動性，并且還能以他們的力量糾正并消滅這種反動性。這就是

爲波蘭蘇聯的革命沒有被托洛茨基派所消滅，中國的抗戰，沒有被汪精衛等所停止的原因，也就是法西斯匪徒成爲人類公敵的原因。

任何宗教與迷信在今天失掉了欺騙作用，這是一個事實。所以儘管希特勒向奧國的人民說，「上帝要德奧合併，」但是奧國的人民深深知道，併吞奧國的是德國的法西斯而不是上帝。儘管莫索里尼如何向教皇誠意致敬，而意大利的人民，深深知道，他是要利用基督教與意大利的僧侶貴族僧侶地主聯盟，鞏固其剝削勞動階級的政權。儘管日本法西斯軍閥如何向他們的勞動人民說，「針布，符咒可以保障你們不變成奴才，而日本的人民，深深知道這不過是把他們騙上屠場。因此，近代的反動者，他們便轉換了欺騙羣衆的方式，他們知道，今天的羣衆，他們并不關心「上帝」而關心的是「麵包」「牛乳」以及一切他們依以生存的「物質條件。」因而所有的法西斯反動匪首都提出足以抓住羣衆心靈的經濟的口號，但是當着這種虛偽的諾言，成爲永遠不能兌現的時候，也和宗教一樣，失去其效用。并且今天的羣衆，由于他們的經驗，他能澈底的辨別這種口號的現實性與欺騙性，所以無論托洛茨基派的口號如何「左」傾，如何同情蘇聯的勞動階級，而蘇聯的勞動階級却能正確地認識他們的口號，只是一種欺騙的空言，只是他們反動的隱蔽。無論中國的漢奸的口號，如何同情中國人民的痛苦，如何爲了國家而自已願意睡罵千秋，但是中國的人民，却能澈底地認識他們的口號，只是出賣民族的幌子。

自然，羣衆的進步，也隨着提高了反動者的技術。但反動者的技術無論如何高明，而終必被羣衆暴露出來。這在蘇聯的歷史證明了，在中國的歷史又在證明着。

在蘇聯「二月革命」以至「十月革命」後，一羣羣的反動分子，資產階級和保皇黨的走狗，都先後被暴露了。如加其可夫（Guchkov）米留克夫（Milyukov）沙非可夫（Shvinkov）克倫斯基（Kerensky）科立